

新中国人民币的发展历程

冯 都

人民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是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筹码，在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享有很高的信誉。人民币发行的垄断性和流通的权威性，是我国主权独立的象征。人民币风雨兼程几十年，经历了从分散到集中，从繁杂到统一，从依赖到独立，从落后到先进的坎坷之路，成为华夏金融文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人民币的诞生

统一货币 1947 年上半年，北方解放区分别发行了华北解放区的北海银行币、晋绥边区的西农币、苏皖边区的华中币等 8 种票币。是年夏，解放区连成一片，贸易联系、物资交流日益活跃。可是货币不统一，比价不固定，成为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的桎梏。因此迫切需要改变货币版别多、种类繁多、折算不便的状况。8 月 1 日，主持财经工作的董必武提出“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的设想，10 月 2 日正式向中央提出《关于建立全解放区银行的建议》，渴望统一货币；银行的名称拟定“中国人民银行”，请中央考虑，并希望银行的名称早定，以便“印钞时要用”。12 月 8 日，中央对董老的建议作了批示，其中谈到“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随后成立以南汉宸为主任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1948年11月18日,兼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召开第三次政务会议,商讨正式“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议案,并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11月22日,向各级政府下达“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训令”,12月1日,又向社会各界发出金字第4号关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布告:

“为适应国民经济之需要,特商得山东省政府、陕甘宁、晋绥两边区政府同意,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决定:

一、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所有三行发行之货币,及其对外之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承受。

二、于本年12月1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下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为本位货币。新币发行之后,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北海币、西农币(下称旧币)逐渐收回。旧币未收回之前,旧币与新币固定比价,照旧流通不得拒用。新旧币比价规定如下(一)新币对冀币、北海币均为一比一百,即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一元等于冀南银行钞票或北海银行钞票一百元。(二)新币对边币为一比一千,即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一元等于晋察边区银行钞票一千元。(三)新币对西农币为一比二千,即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一元等于西北银行钞票二千元。

以上规定,望我军民人等一体遵行。如有拒绝使用,或私定比价,投机取巧,扰乱金融者,一经查获,定予严惩不贷。”

筹划印制 中央原计划在1949年1月1日元旦正式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发行人民币,兑换旧币。但因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握,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顺利进行,东北野战军进关,平津解放在即等,因此亟须加快筹备步伐,提前一个月

实现建行计划。

筹备处在南汉宸领导下,从各地抽调何松亭、石雷等 8 人专司筹建工作。首先请董必武为人民币票面题字,董老在一张纸上横竖写了“中国人民银行”、“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万”、“圆、角、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年”等字样。接着组成一支设计队伍,并集体讨论、修改人民币上的图案。当时,印刷局王益久和沈乃庸在设计时有毛泽东的头像,送审时,毛泽东说:“人民币是属于国家的,是政府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怎么能把我的头像印上呢?”不久他又指出:“为了制止传统的歌功颂德现象,要遵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不得在人民币上印刷我的像。”于是重新设计,改为反映工农群众生产建设场景的图案。

由于印制人民币的技术与设备要求极严,那时只有东北印钞厂才能胜任,故由佳木斯的东北银行印钞厂代印。为了防止意外,新印的人民币不切开,不加印号码签章,印好后由大连经烟台运达石家庄加工为成品。这样到 1948 年 11 月底,已积存印好的人民币足有五六马车。”

首批人民币问世 1948 年 12 月 1 日上午 9 时,刚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发行了第一批人民币——伍拾元券、贰拾元券、壹拾元券三种票币,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也同时发行。从此,新中国本位货币在神州大地问世了。其中伍拾元券人民币第 1 号(I II III—00000001)被直接发行票币的石雷科长收存。当天下午,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在石家庄花园饭店设了一桌便宴,以示热烈庆祝这一重大事件。

当年新华社石家庄分社记者夏景凡走上街头,采写了《新币发行的头一天——石家庄街头特写》的通讯,次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该文对发行盛况作了生动描绘:

“街上宣传栏前从早到晚挤满了人，像看胜利消息一样露出欣慰的表情。”石家庄分行早上一开门，很多人挤着争看新币票样，取款的人都要求搭配新币，人民有着一种先睹为快的心情。”这天分行异常热闹，营业员应接不暇。人们首次拿到新币，总是反复凝视着。一个工人说：‘我看不久就有领导全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了。’”

人民币的发行，是我国货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它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有着特殊的含义，它宣告结束旧中国遗留的金融混乱局面，实现了全国货币大统一，为建立新型的红色货币制度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四套人民币的发行

第一套人民币 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自 1948 年 12 月 1 日起至 1953 年 12 月止，共印制发行了 12 种面额、62 种版别的人民币。其中 1 元券 2 种、5 元券 4 种、10 元券 4 种、20 元券 7 种、50 元券 7 种、100 元券 10 种、200 元券 5 种、500 元券 6 种、1000 元券 6 种、5000 元券 5 种、10000 元券 4 种、50000 元券 2 种。

建国之初印制的人民币是由中央美术学院著名教授罗工柳以及周令钊、王式廓等人设计的。第一套人民币发行后，原来流通在各解放区的地方币陆续停止发行，并按金字第四号布告的比价收回。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迁至北平，随后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银行相继成立。1951 年底，全国范围内货币基本统一，人民币成为我国通用货币。但是由于当时受各种条件所限，设计思想不够明确，面额差别很大，品种繁多，纸张不一，易于造假，加上老厂新厂一齐上，新旧设备一齐用，工艺技术多达 7 种，因此票币质量参差不齐，必须组织力量加以改进。

第二套人民币 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自 1955 年 3 月 1 日起至 1962 年 4 月 20 日止,共印制发行了 11 种面额、17 种版别的人民币。其中有 1 分、2 分、5 分、1 角、2 角、5 角、1 元、2 元、3 元 5 元、10 元券和金属硬分币 1 分、2 分、5 分以及黑色 1 元券和棕色 5 元券。

第二套人民币是在新的形势下发行的。当时五年建设计划顺利进行,商品库存和黄金储备连年增加,市场物价空前稳定。但是由于第一套人民币面额太大,以万元为单位计算,给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大不便。因此,在 1955 年 2 月 21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和收回第一套人民币的命令》,规定收回的折合比率为 1:10000,即第二套人民币 1 元等于第一套人民币 1 万元。

第二套人民币是由罗工柳、周令钊设计的,他们在设计过程中,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极大重视和关怀,亲自审定了整个方案,作了许多具体指示,因而主题思想明确,印制工艺先进,主辅币结构合理,图案颜色新颖,体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风貌。同时在印制技术上,除分币外,其他券别全部采用胶凹套印,使票币具有版纹深、墨层厚等特点,还具有反假防伪的功能,因此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称赞这套人民币好看、好认、好算、好使,成为我国首次发行完整精致的优良货币。

第三套人民币 第三套人民币的发行自 1962 年 4 月 20 日起至 1980 年 4 月 15 日止,共印刷发行了 7 种面额、13 种版别的人民币,其中有 1 角券(币)4 种、2 角券(币)2 种、5 角券(币)2 种、1 元券(币)2 种、2 元券 1 种、5 元券 1 种、10 元券 1 种。

1962 年 4 月 20 日公布发行了两种面额人民币,即 1956 年版棕色 5 元券和 1960 年版枣红色 1 角券,前者系对 1955 年 3 月 1 日发行的酱紫色 5 元券的更换调整,故仍属第二套人民币的最后一

个版券,后者才是第三套人民币的开始。接着 1964 年 4 月 15 日发行深绿色 2 元券和墨绿色 2 角券;1966 年 1 月 10 日发行有天安门水印的 1965 年版 10 元券和 1962 年版 1 角券;1967 年 12 月 15 日调整发行 1962 年版 1 角券;1969 年 10 月 20 日发行深棕色 5 元券和深红色 1 元券;1974 年 1 月 5 日发行青莲色 5 角券;1980 年 4 月 15 日经国务院批准,开始发行 1 角、2 角、5 角、1 元四种金属人民币,其面额同纸币价值相等,在市场上混合流通。

第三套人民币经过 18 年的逐步调整、更换,陆续回收旧币中的 10 种券别,取消了 3 元券,增加了金属币。这套人民币是从 1958 年开始设计的,设计小组成员为罗工柳、周令钊、侯一民、陈若菊、邓澎等 5 人。由于设计思想鲜明,比较集中反映了当时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在印制工艺上继承了传统风格,图案美观大方,花纹线条精细,色彩新颖明快,还增强了反假防伪能力。

第四套人民币 第四套人民币的发行自 1987 年 4 月 27 日起至 1992 年 8 月 20 日止,共印制发行了 9 种面额、14 种版别的人民币。其中 1 角券(币)2 种、2 角券 1 种、5 角券(币)2 种、1 元券(币)2 种、2 元券 1 种、5 元券 1 种、10 元券 1 种、50 元券 2 种、100 元券 2 种。

第四套人民币设计仍为罗工柳等 5 人,他们本着体现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精神,在设计风格、主题思想和印制工艺上都有新的突破:一是 100 元券采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侧面浮雕像,50 元券采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人物头像,其他券别采用我国 14 个民族人物头像。二是主币背面图景取材于我国名胜古迹、名山大川,如井冈山主峰、黄河壶口、珠穆朗玛峰、长江巫峡、南海‘南天一柱’和长城等。三是票面纹饰全部采用民族风格图案,如凤凰牡丹、仙鹤松树、绶带鸟翠竹、燕子桃花等。四是采用满版古钱水印和固定人物头像水印,明暗层次

分明,工艺技术先进,大大提高了反假防伪的能力。这套人民币采取了“一次公布,分次发行”的办法,于 1987 年 4 月 27 日首先发行 1980 年版 50 元券和 5 角券;1988 年 5 月 10 日发行 1980 年版 2 角券、1 元券、2 元券、100 元券;1988 年 9 月 22 日发行 1980 年版 1 角券、5 元券、10 元券;1992 年 6 月 1 日发行 1 角、5 角、1 元三种金属币;1992 年 8 月 20 日发行 1990 年版 50 元券、100 元券。第四套人民币发行后,对促进经济迅猛发展,提高社会工作效率发挥了巨大作用。

流通纪念币从 1984 年 10 月 1 日到 1993 年 12 月 26 日,我国先后发行流通金属纪念币 17 套共 27 枚。它的金属成份分别为铜镍合金、铜锌合金、钢芯镀镍。具体品种见下表:

序号	流通纪念币名称	枚数	面额	发行日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5 周年	3 枚	1 元	1984 年 10 月 1 日
2	西藏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	1 枚	1 元	1985 年 9 月 1 日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30 周年	1 枚	1 元	1985 年 10 月 1 日
4	国际和平年	1 枚	1 元	1986 年 9 月 20 日
5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40 周年	1 枚	1 元	1987 年 7 月 30 日
6	第六届全运会	3 枚	1 角	1987 年 11 月 20 日
7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30 周年	1 枚	1 元	1988 年 9 月 20 日
8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 40 周年	1 枚	1 元	1988 年 12 月 1 日
9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30 周年	1 枚	1 元	1988 年 12 月 1 日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周年	1 枚	1 元	1989 年 9 月 28 日
11	第十一届亚运会	2 枚	1 元	1990 年 8 月 22 日
12	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10 周年	3 枚	1 元	1991 年 3 月 2 日
13	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	3 枚	1 元	1991 年 6 月 18 日
14	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	2 枚	1 元	1991 年 11 月 1 日
15	宪法颁布 10 周年	1 枚	1 元	1992 年 11 月 27 日
16	宋庆龄诞辰 100 周年	1 枚	1 元	1993 年 1 月 16 日
17	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	1 枚	1 元	1993 年 12 月 26 日

流通纪念币发行后,由于很多人把它珍藏起来,因此出现大量沉淀,一直难以流通。

此外,我国还发行了各种金、银、铜纪念币,以纪念重大事件、重大成就和杰出人物,如 1979 年至 1988 年发行 53 种金银纪念币;1979 年至 1988 年发行 22 种金银纪念章;1979 年至 1990 年发行 55 种铜质纪念章。这些纪念币、章都具有货币形式,但一般不参与货币流通。鉴于发行数量少,均被爱好者视为珍品,广为珍藏。

至此,新中国独立完整而又步入世界规范化的整套人民币体系最后形成。

人民币的坎坷之路

撩开历史面纱 新中国诞生后,人民币也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经历了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它的变迁历史,几十年来一直秘而不宣,以至当今仍感鲜为人知。

第一套人民币印制了两种 50000 元券,当时考虑到国际环境影响和国内的经济状况而没有流通。其它券种除少数几种印有蒙、维文外,绝大部分只有汉文一种文字,不便在少数民族地区流通,成为 1955 年 2 月退出流通领域的原因之一。以后新版人民币,全部印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壮文四种。此外,1980 年版人民币从 1 角券到 10 元券,共印有 14 个民族人物头像,即 1 角券是高山族和满族,2 角券是布依族和朝鲜族,5 角券是苗族和壮族,1 元券是侗族和瑶族,2 元券是彝族和维吾尔族,5 元券是回族和藏族,10 元券是蒙古族和汉族。

第二套人民币设计时,周恩来总理看了方案,提出应表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和各民族大团结的主题思想,如提出“一角钱,中小学生使用最多,要突出一个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题内

容。”同时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再次不赞同把他的图像印在钞票上的意见。票面书法是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员马文蔚应行长之邀题写的墨宝，少数民族文字是该民族书写能手的手写体。接着设计人员奉命前往莫斯科，同苏联达成协议，由他们提供印钞纸张和设备。然而在实施过程中，“老大哥”却突然变卦，保留了从1分券到10元券11个纸币品种中的3、5、10元券的钢板。于是该套人民币的这3种票币被迫在苏联印好后运回我国。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我国的印钞造币工业只能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得到技术援助。当时的印钞纸全部从苏联进口，纸面的防伪水印图案也是从苏联做好后运回，油墨颜料则从香港购进。但是，1959年苏联突然撕毁合约，对我国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形下，我国造币工人只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最后在保定造纸厂试制成功了第一批满版水印钞票纸。于是在1964年后，第二套人民币陆续停止了流通。

第三套人民币诞生在六十年代的调整时期。当时印制工作遇到许多困难，原计划从国外引进高级印钞机，结果因国际关系紧张而“泡了汤”。中国青年技术员李根绪向在北京的苏联专家康诺诺夫讨教，结果这位“老大哥”连连摇头说：“这是仅次于原子弹的绝密技术，不能外传。”自尊心、自信心支撑着中国制钞专家，凭着一股韧劲，终于在三年困难时期设计出第一台一版四色的凸版印钞机和一版四色的凹版接纹印钞机，加上我国水印钞纸、油墨和传统钢版雕刻新技法的研制成功，使我国第三套人民币一步跨越了二十年，跻身于当时国际一流水平，结束了依靠洋人印钞票的时代，并于1964年4月断然收兑苏联代印的3、5、10元券人民币。

第四套人民币则是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起初没有考虑50元券、100元券两个票种，后来广大群众纷纷反映，在购买贵重物品时，要提上大量现金，希望发行较大面额的人民币。银

行经过多方比较,为便利流通和交易,决定满足群众要求,发行 50 元券和 100 元券的大额票币。

经受严峻考验 随着人民币的投放量日益增多,国内外一些不法分子炮制的假币也在市场上鱼目混珠。近年来,假币在流通领域频频出现,形成了一股暗涌着的金融黑潮,在人们心里投下了一片令人惶惶不安的阴影,给社会生活带来很大危害。最早发现假币是苏联撕毁合约不久,在新疆中苏边境的塔城地区,发现成箱的 3 元、5 元、10 元券;后据香港报纸报道:“……大陆各地流行的人民币假钞,大多来自香港、台湾……。”境内福建、深圳也发现多种版本假币。这些铤而走险的不法之徒,制造的假钞手段多端,概括起来,一是采用电子扫描分色机制版,二是利用复印机复印后上色,三是用特制药水拓印,四是照相影印对贴,五是刻板印刷,包括石版、木版、蜡版等。如 1982 年 6 月深圳海关发现流入 60 余万元的 10 元券假钞又如 1988 年 5 月 10 日,我国宣布发行的 100 元券面世不久,8 月间就发现由香港流入的 100 元券假钞达数十万元。

为了维护人民币的信誉,确保人民币的正常流通,1992 年 4 月 6 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反假人民币工作的通知》,动员全社会力量,深入开展反假币斗争。一方面对犯罪分子狠狠打击,按照我国《刑法》第 3 章第 122 条规定:“伪造国家货币或者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方面加强了反假币的组织管理工作,普及识别真假人民币的方法(即直观法、仰光法、手摸法、质感法、丈量法、仪器鉴别法)。经过司法部门的严厉打击,取得了很大成绩。然而实践证明,要使假币“幽灵”根本清除,还在于改进印制工艺,增强保险系数,如借鉴美钞的“压印全息”加拿大的左上角光学安全装置、意大利的嵌进一

条金属箔、日本的添加特殊元素等经验。同时广泛采用信用卡,减少现金使用。

信誉传颂周边 人民币孕育于大革命时期,诞生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之中,每套人民币都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每种票币都凝聚着各种知识,能给人新的启迪和美的享受,是我国现代金融的货币文化,因此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人民币是与黄金脱钩的不兑现纸币。它所研制成功的水印工艺,不仅填补了我国印钞史上的空白,还使我国防伪技能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有些技术还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并承担了一部分援外货币的印制任务。我国生产的熊猫金币和银币,在国际硬币比赛中,还双双荣获最佳桂冠,因此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优秀货币。四十多年来,尽管币值时有下降之虞,仍保持了较好的稳定。虽然近年来纸币发行过多,物价上涨过快,但只要国家决心调控,人民同舟共济,定能战胜通货膨胀,加强人民币的信誉。

1993 年春,中国政府颁布允许人民币出境的法令,从此人民币跨出国门,在海外露面,尤其在周边国家和地区‘风光’起来。如越南、老挝等国流通的人民币高达 15 亿元,缅甸边贸 25 亿元,俄罗斯已接受人民币作为对华出口支付手段,韩国也规定可直接作为出口货款接收,泰国、巴基斯坦、印度也在境内广为流通。香港更是热闹非凡,汇丰银行‘所属 70 个支行自由兑换’,宝生银行‘每天也有 600 多人次挤兑。可以说,‘人民币市场’正在周边国家和地区首先形成,并以新的面孔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元、英镑、马克、法郎等国际硬通货币一比高低。

1994 年元旦,我国政府宣布取消人民币官方汇率,实行汇率并轨和外汇价改,使人民币逐步登上国际经济舞台。

人民币来到世间,饱经近半个世纪沧桑,现正在雄心勃勃地走向世界。

建国初期的剿匪斗争

石玉山

建国初期,匪患严重。国民党反动派,除组织残余部队在边远省份继续顽抗外,在我军最后解放的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和华北广大地区及沿海岛屿,有计划地留置下大批反动武装和特务。他们勾结恶霸地主,搜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利用反动会道门,发展反动组织;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这批反动残余,数量较大,活动猖獗。西北地区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新疆五省,有股匪达4万5千余,以甘肃为重点,以其他四省为配合,组织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曾一度造成地区性的社会混乱。西南地区除云南外,仅1950年1、2月间,就发现匪特20余万。计川东约5万,川西5万余,川南、川北各约3万,贵州3万余,西康雅安分区约1万,另西昌会理贺国光部约9千。其中最大之股匪为川东之川湘鄂“人民自卫军”(后改为中国救国军大陆游击队),约5千余人,川东北游击总队3千余人,川康边境之程之武部5千余人,川南之川湘游击总队2千余人;“反共保民救国军”2千余人,“中国人民自救军黔北游击队”2千余人。他们欺骗群众,胁迫入伙,如不从驯,以烧房、杀人相迫害。中南地区共有匪特35万6千6百余人。当时仅豫西地区就有匪特2万余,匪首程秀之受胡宗南指挥,占据以卢氏为中心的大片地区,以胡匪秦岭防线东部为屏障,构成整体防御。进可以窥我中原,退可以据守巴蜀天险,企图与我长期对抗。大别山地区的匪特,在白崇

禧策划下,发展到 1 万 8 千人,号称“鄂豫皖边人民反共自卫军”,活动于以金寨为中心的 10 数县内。蒋介石对上述两股匪特寄予极大希望,试图在我中原腹心地区插进两柄利刃,开辟战场,以配合其正面主力作战。湘西 23 个县境内共盘踞大、小股匪 8 万余人。广西南部边远地区最多时达到 2 万人,北面大小瑶山地区近 1 万人,西北部地区达 2 万至 3 万人。华东地区之苏、鲁、皖、浙、闽约计 850 余股,共 6 万余人。其中最严重的地区为福建,建制尚完整的股匪就有 240 余股,计 4 万余人,并盘踞我 9 座县城,在闽西及省的边界地区及沿海岛屿、交通两侧、深山地带,匪特活动尤其猖獗。华北地区解放初期发现匪特 3 万余人,以绥远地区为最多,且多为骑匪,危害极大。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初期各地区共发现土匪近 60 万。而且,随着国民党主力军的连续溃败,匪特人数不断增加,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和派遣第七舰队侵占我台湾后,匪特活动气焰日盛。

这批匪特武装的基本特点和主要成分是以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反动军官为领导,以惯匪、国民党残余部队和散兵游勇为骨干,以地主恶霸、封建势力、帮会团体为靠山,并以一部分被胁迫、受蒙蔽的落后群众作掩护的一种武装反革命集团。这些反动残余的组织成分大体可分为四种:一是国民党的溃散部队和有计划留置下来,在我已解放的地区坚持活动的反动特务武装,在政治上最为反动;二是惯匪,即所谓职业土匪,也称经济性的土匪。这类土匪为特务所利用,活动比较狡猾,有较长期的东抢西劫的经验;三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多为生活所迫被特务收罗。这些人破坏性较大,但无立场,容易瓦解;四是特务利用封建迷信团体,胁迫、欺骗来的贫民,或因当时某种政治的、经济的及民族压迫等原因,出而为匪的。另外,还有一种平时为农,遇机会临时纠集抢劫的季节性土匪。

这些匪特武装危害极大,严重威胁着新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他们的活动方式最主要的是:一、破坏我们的基层政权,占领城市,或封锁城市,控制农村,企图重新恢复或建立伪政权。二、破坏城乡交通,抢劫人民财物,杀害群众,扰乱社会秩序。三、干扰我军后方,袭击、绑架、杀害我军外出人员。四、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发展匪特武装。

这样,我军在基本上歼灭国民党在大陆上的反动军队以后,面临着保卫新生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安全的严重的剿匪任务。

遵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我军剿匪的基本方针是 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在匪情严重的地区,则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争取为辅,军事政治双管齐下 在一般情况下,则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军事打击或政治争取的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加强地方武装,进行民主改革。对匪特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策略指导的基本原则是 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以求达到打击、瓦解、争取与最后消灭匪特之目的。

从 1949 年 5 月开始,各大军区,在继续追歼残敌的同时,先后抽调了大约 39 个军,144 个师的大部兵力,在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在地方武装、民兵和广大群众的密切协助下,结合民主改革、减租退押、镇反清霸、抗美援朝等中心工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整个剿匪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军事进剿。主要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匪情严重的地区,采取奔袭、合围、追击等军事行动,给股匪以歼灭性打击,使其失去集中活动的的能力 第二,分兵驻剿。主要是股匪被歼灭或被击溃以后,我即以一定数量的部队驻防,加强对面的控制,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政治攻势,进一步消灭分散活动的匪特; 第三、最后肃清。主要是以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建立革命政权等项中心工作为主,深入发动群众,武

装群众,铲除匪特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彻底消灭潜散匪特。

各地区剿灭匪特的具体情况是:

西北地区 1949年,国民党在这个地区的匪首王凌云、乌斯满、马英等煽起的政治性暴乱被我军扑灭后,匪特活动仍很猖獗。从1950年1、2月开始,分驻西北5省的第一野战军各军及驻军独立师(旅),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择其气焰凶恶、危害较重的首要股匪,举行了大规模的进剿。在川陕边区歼灭了王凌云匪部在临夏地区,全歼了马保、马八娃、马英贵等三大股匪在青海,歼灭了马老五股匪在宁夏地区,歼灭了马绍武等股匪河西地区、陕北地区的股匪,也先后就歼。这时,西北各省除新疆部分地区外,局势暂时转为平稳,我军大部由剿匪转入生产建设。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部队逐渐产生和平麻痹思想,对匪特再起缺乏警惕,故匪势又趋猖獗。平凉地区匪首马元山,在四川受胡宗南、马继援指示后,返回平凉,发展组织,建立据点,至5月竟发展到近万人,自称“忠义救国军”陕南镇巴地区匪首刘统,组成所谓“中国青年救国军”千余人关中地区的残匪由1千人发展到3千人临夏地区降匪马保等复逃为匪青海地区残匪马德山、马鹿、马广城等部,于西宁西北地区积极活动宁夏地区惯匪郭栓子(宁夏解放时向我投降)叛变后,盘踞贺兰山,自称“黑虎军”,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反苏讨共军”,气焰异常嚣张新疆地区在乌斯满匪特策动下,起义部队骑兵第七师,乘我军转入生产之际,接连发生1个整营12个整连,计2500余人的叛变,虽经围剿,但乌匪乘机发展至7千余人,除大肆抢劫外,还杀害我哈密至安西沿线的交通人员,围攻我驻伊吾守军连队。根据这种情况,西北军区于5月再次发出指示,各部队先后召开剿匪会议,纠正轻敌思想,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划区清剿匪特,限期完成任务。各部队对本地区的匪特再次展开大规模清剿。至7月间,将马元山、马保、马明义、马鹿、张

斌等股匪基本歼灭。但仍有残匪 200 余股,计万余人,窜入各省边境山区,或转入分散隐蔽活动。针对匪特活动的特点,各地区组成由部队指挥员和地方党政干部参加的“分区联防围剿指挥部”,结合本地区的社会改革,充分发动群众,展开省与省、县与县以及大行政区之间的联合清剿。至 1950 年底,股匪活动地区逐渐缩小,由分散而集中,形成四股较大的匪帮,约 5 千余人,窜入甘、青、新交界之柴达木盆地。我随之组织甘、青、新三省部队进行会剿。从 1951 年 1 月 28 日至 3 月 24 日,经近两个月的战斗,大部残匪被我歼灭,并在海子地区活捉匪首乌斯满。至此,西北地区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基本结束,共歼灭匪特 7 万 2 千余人。

西南地区 西南地区解放后,我军除以一部准备进军西藏外,将部队实行彻底分散,分区包干,担负城市接管,开辟农村工作和剿灭土匪等任务。1950 年 2 月初,西南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定,首先歼灭腹心富庶地区之匪,尔后推展至边沿贫瘠山区,特别要迅速净化四川腹地,以保证征粮和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西南军区根据会议精神,在加强部队教育的同时,对剿匪工作进行具体布置:一方面加强腹心城镇的守备,和组织有关部队以分段包干的办法,加强对川江、嘉陵江、岷江、成渝、川康、渝筑、昆筑等主要交通干线的守备、护航及其两侧的剿匪工作;一方面集中必要的兵力,对各省腹心地区,特别是四川腹心地区的大股土匪,组织重点围剿,而对各省边沿地区,特别是贵州及川东、川南边沿地区的 30 余座县城和若干边远地区,则暂时撤出或置之不顾,留待尔后逐步解决。

各部队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组织若干机动兵力,于 3 月至 7 月间,进行了一系列的重点围剿。其中主要的有:川东军区对涪陵、南川、巴县地区的围剿,并首次开创了歼灭匪特万余人的成功范例。接着在武隆、彭水以南地区,桐梓山区和彭水、黔江、酉阳地

区,组织了围剿。川西军区镇压了成都东南之尤潭寺、石板滩地区匪特的两次暴乱,并在邛崃、大邑、总岗山地区,灌县东北,安县、彰明、江油之间,新津、双流、仁寿之间以及双流以西地区,组织了若干次围剿和进剿。川南军区在长江以北地区,雷波、马边、屏山地区及横山、安边地区,组织了围剿。川北军区在渠江、涪江、嘉陵江三角地带组织了围剿,并镇压了南充、射洪、中江地区的匪特暴乱。西康军区在西昌地区、总岗山区及大渡河两岸,组织了围剿和进剿。贵州军区在瓮安、余庆、湄潭地区,金沙地区及石阡西南地区,组织了围剿。云南军区在玉溪、新平、易门、通海地区和牟定、盐新、广通地区组织了若干次围剿和进剿。各部队充分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原则,对集中的大股土匪,以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组成纵深合围圈,严密控制渡口及大小道路,断匪逃途,尔后以数十路的梳篦队形,向心合击,纵横扫荡,使匪无机可乘。对较小股匪,则出其不意,远程奔袭,直取巢穴,力争全歼。对流窜的股匪,则不分地区,不计远近,跟踪追击,不歼不止。在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的同时,各部队组织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吸收了一些开明士绅和进步分子参加建立了专署、县、区剿匪委员会和剿匪生产委员会,乡保两级组成剿匪小组。通过这些组织,利用各种关系,深入开展对土匪的瓦解争取工作。至 1950 年 7 月,全区歼匪 37 万。各省腹心地区基本净化。但是,西南广大农村,封建势力仍占优势,我们的阵地尚未巩固,若干边沿地区,特别是贵州边沿地区尚有 21 座县城为匪盘踞;云南地区的土匪在美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下,也正在积极进行破坏活动;广大腹心地区的潜散匪特,仍然以公开或隐蔽,合法或非法,以及利用根据地和流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种捣乱破坏活动。

据此,7月下旬,西南局召开了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会上据毛主席指示决定,从 1950 年冬至 1951 年春,在全区开展清匪反